

第 23 卷



王蒙文集



第 23 卷

论文学与创作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录

创作谈 自序

林震及其他	(3)
给《北京日报》编辑的复信	(7)
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10)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	(15)
关于《春之声》的通信	(19)
我愿多写点好的故事	(25)
倾听着生活的声息	(29)
关于创作的通信	(43)
谢谢你,爱读《青春万岁》的朋友	(57)
诗情词意	(60)
文学与我	(63)
撰余赘语	(71)
我的第一部小说	(75)
梁有志他	(79)
关于我的推理小说新作	(81)
我的六本新书	(82)
好戏还在后头	(84)
我写《暗杀 3322》	(89)

止于流血 止于画龙	(92)
长图裁制血抽丝	(95)
关于《夜的眼》	(97)
亮点与痛点	(99)
困难与跨越:关于弥赛亚情结	(100)
叠印与你的花园	(116)
《冬雨》后记	(118)
我在寻找什么?	(120)
《深的湖》序	(128)
《布礼》英译本前言	(130)
蝴蝶为什么得意	(131)
《冬雨》序	(133)
《表姐》序	(135)
《轻松与感伤》序	(136)
我的写作	(137)
漫游这个世界	(139)
《在伊犁》台湾版小序	(142)
如诗的篇什	(144)
《王蒙荒诞小说自选集》序	(147)
《王蒙漫游美文》序	(149)
《新疆精灵》序	(151)
人与时间	(153)
《只要心儿不曾老》序	(155)
这一束束玫瑰	(156)
说话的活性	(158)
《红楼启示录》韩文版序	(160)
致韩国读者	(161)

文艺杂谈

栽培	(165)
关键在于质量	(168)
让文学永葆青春	(170)
悲剧二题	(172)
谈“收”	(177)
窝头就蜗牛,再加二两油	(181)
探索断想	(183)
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88)
把文艺评论的文体解放一下	(191)
新的世界 新的文学	(194)
说“贫乏”	(196)
感谢和呼吁	(198)
切莫拥挤在文学小道上	(200)
长篇小说要水涨船高	(204)
祝《青春》丛刊创刊	(206)
且说“撞车”	(207)
文学与文学之外	(211)
长篇小说是史诗	(215)
致习作者	(216)
我们为什么自豪	(218)
搞文学这条路	(221)
不懂之后	(223)
贺“希望文学丛书”出版	(225)
当我想到一九八六	(227)
攀登艺术高峰无捷径	(229)
给孩子一个世界	(232)

谈“兴奋”	(233)
遥祝《中国西部文学》昌盛	(236)
我的祝愿	(237)
贺《收获》三十岁	(238)
剧场拾艺	(239)
漫说喜剧	(243)
也谈文学作品的读者面	(247)
对深刻与真挚的珍视	(249)
关于文艺批评的一封信	(255)
文学评奖与文学尊严	(258)
话说实验小说	(261)
题《青春》微型纪实文学青春奖	(264)
秋夜漫话“新世说”	(265)
白话文是中文吗?	(266)
致鲁枢元信	(270)
你为什么写作	(272)
周末与文化	(276)
调侃	(278)
王朔的挑战	(281)
漫话文艺效果	(285)
再说文艺效果	(288)
题材与作家	(292)
建设与文艺	(295)
为了民族的生机	(298)
中国的先锋小说与新写实主义	(300)
文学绿浪	(303)
文学与企业家	(305)
苏联文学的光明梦	(307)

最好再从容些	(317)
作家从政	(322)
贺《人物》十五岁	(325)
文化市场一议	(326)
关于散文	(331)
艺术属于人类	(333)
先锋文学失败了吗?	(335)
祝愿和希望	(339)
关于晚报文体	(340)
冤屈的魅力	(342)
清明的理性	(345)
文学与世界	(348)
大愚若智话阿甘	(352)
自由与质量	(354)
精神食粮	(356)
面对真实的世界	(358)
美丽围巾的启示	(360)
你赢得尊敬了么?	(367)
写作这一行	(371)
活动的限度	(375)
通俗、经典与商业化	(378)
华文创作的魅力	(386)
小说永远不会被替代	(389)
泡沫与文学	(391)
回眸琐记	(393)
长篇小说的历史感	(396)
莎乐美、潘金莲和巴别尔的骑兵军	(399)
安徒生	(408)

北京奥运的文化意义	(410)
请爱护我们的语言文字	(412)
从文化紧张到文化和谐	(414)
也谈一点中国的当代文学	(417)
享受自己的文化	(422)
演出、表演与展演“秀”	(427)
从赵本山的《不差钱》说起	(429)
平常心看待当代文学	(431)
六十余年的性沧桑	(433)
两三千册的新文学大系	(442)
文化三说	(444)
让春节成为百姓畅言的节日	(448)
欢欢喜喜过大年	(450)
呼唤经典	(452)
文化,可不仅仅是品牌	(457)
让中华文化在我们手中发扬光大	(459)
重树文化的公信力	(461)
汉字之恋	(463)
话说泰戈尔	(466)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469)
中华传统文化与软实力	(471)
谈词说字	(473)
浏览、阅读与我们精神生活的质量	(484)
从莫言获奖说起	(488)

创作谈 自序

林震及其他

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①中，林震这一人物的处理带给我不少的困难。

我无意把他写成娜斯嘉式的英雄，像一个刚刚走向生活的知识青年能够像娜斯嘉那样。那似乎太理想化了，如果生活里一边是娜斯嘉、正确的同时坚信自己的正确的娜斯嘉，一边是阿尔卡琪、显然可鄙的阿尔卡琪，新与旧的斗争就会简单和顺利得多。不遂人愿的是，往往一些热情学习娜斯嘉的人竟全然不像娜斯嘉那样无可指摘，因而他不可能像娜斯嘉那样坚定、正确。他们正在成长，正在战胜周围的落后势力的斗争中战胜自身的缺陷。遵照生活的提示，我试写了林震。

林震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新人，对于他说来，除了遵照党章、党课和他心爱的小说、书籍来生活就没有别的道路。除了做好工作，使自己度过的每一个日子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以外就没有别的愿望。爱生活，爱党，爱同志，爱美，并为了他所爱的而斗争，自然地融合于他的血肉之中，而且带有他自己的年轻人的特质。

但是，被林震奉为神圣的那些新的工作和道德原则，还没有经过生活实践的锻炼和丰富。林震本人，若没有他的追求、斗争，便显得空洞浮泛，不切实际，他往往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惶惑起来。他的对于一切失误的追根究底——他说的“不容许党的机关有缺点”虽然表

^① 后改题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现了可贵的政治责任感,却也是过分天真的幻想,生活的激流本来不是消过毒的蒸馏水。因此,他也就无力提出改正工作的有效建议,除了在区委常委会上喊几个口号以外。很明显,如果林震不好好锻炼自己使自己变得成熟,他虽然不乏某些可爱的“精神”,却也终无大用。

不论在生活里还是作品里,支持娜斯嘉是较少危险的(最近的讨论中也有祸延娜斯嘉的苗头),林震却相当使人伤脑筋,这不仅因为林震不是那么有力,也因为林震不是那么正确。何况,林震的某些言语所引起的同情的回声,又往往是与林震本人的探索语调有所不同的偏激喊叫。

我想起一个笑话,据说一位名人曾指着一个“已经证实”为新生力量的青年说:“我是一贯支持新生力量的,譬如他吧,我就支持。”但是,等到“未经证实”的新生力量找到他的时候,他却摆起十足的架子。同样,当娜斯嘉与阿尔卡琪一同走进我们的办公室,又有尼古拉耶娃同志引见他们,那么大多数人是会支持娜斯嘉的。当林震敲响了我的门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不掩饰在“这一个”麻袋厂事件中,我基本上站在林震方面,特别是当不仅刘世吾与韩常新嘲笑林震,并且许多可敬的同志把林震从无产阶级阵营当中开除出去的时候。林震不参加韩常新的婚礼,把烂荸荠扔在地上(自是有碍卫生喽),毕竟是上帝允许犯的错误。林震常常怀疑自己,一方面是软弱的表现,一方面却也表现了他并不刚愎,而他的敲叩领导同志的房门,也标志着孤军作战阶段的结束。有什么理由对待他比对待刘世吾和韩常新更苛刻呢?不爱青年的人是没有权力教育青年的,正像不教育青年的人没有资格爱青年一样。

谈到教育青年,作者必须惭愧地说,他并没有全面地向青年指点前进的道路,由于不全面,林震这一形象还有被误认成“模范”“榜样”的危险。这首先是由于作者认识上的问题(下面再详细谈),其次作者碰到了一系列艺术表现上的困难。第一,如果增多对林震的

批判性的描写,就会使这一个麻袋厂事件混乱起来,混淆了对于刘世吾(他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林震只是他的见证者)的责备和期待(注意:并不是憎恨)。顺便说,作品最初构思的时候,作者曾经想在林震的身边再写一个偏激片面、目空一切的狂热分子,通过写他,可以更好地表现反官僚主义中两条战线的斗争,但是,作者未能胜任这样的结构设计,所以作罢了。第二,作者还没有能力在“这一个”作品中,写出一个有血有肉而又完美无缺的人物,有了这样的人物,自然可以提供正确的表率并且大大增加作品的乐观气息的,即使写了这样的人物,能否恰当地安插到“这一个”环境和这一组人物中,也还是问题。这里需要感受的成熟与构思的和谐,那些认为没有写伟大的领导人物就是对领导不尊重的人,是过于简单了。第三,在一篇小说中对复杂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做全面的论证,对林震一言一行的是非做清醒的估计,都不是没有困难的,如果写论文,事情就好办得多。作者只能对他的主人公的主要精神状态,表示大体的肯定或否定,或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质疑。当作者没有能力判决自己的人物时,他只好在表示一定的态度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疑惑,只好请同志们帮助解答,只好把自己的作品当做一粒种子而不是当做成熟的果实。只有允许作者在肯定生活、干预生活的基础上提出我们时代的“怎么办”,才能更好地发挥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的作用。谁能说,生活中的一切人物,一切矛盾,都已早经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都已有了结论,因而必须表现结论,却不能抛砖引玉呢!谁能说,必须等到作家对一切矛盾的解决胸有成竹的时候,才可以写出作品呢?作家提出“怎么办”来(当然不是仅仅提出),正是为了促进矛盾的解决。

按这样的想法写小说,必然产生一些副作用,因为作者没能够克服上述困难,也因为当今作品中的黑白脸给人的影响太深了,正面人物就必然是作者狂热歌颂、竭力提倡的,这是许多人的逻辑,他们不可能设想,正像人物在生活中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作者对人物的认

识、态度、感情也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甚至是有某些矛盾的。(林震和刘世吾都反映了这种矛盾。)于是狂热歌颂林震的意见出现了,大骂作者的狂热歌颂的意见也出现了,这两种意见在争论中互为因果各走向其极端,而作者无限惶恐了。

责怪作者没有标明“此正面人物未经保险,读者慎勿轻易仿效”是可以的,同时,咀嚼作品需要读者的牙齿,厨师把馒头蒸硬了,应该检讨,不过,再好的厨师也不能造出牙齿来。

1957 年

给《北京日报》编辑的复信

编辑同志：

来信收到了，谢谢你们关心。

这次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得到了那么多的老师，他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的可贵的意见。作为一个初学写作者，我感激极了。

说真的，去年开始讨论那篇小说的时候，有些意见我是没有认真考虑的，主要是觉得自己在写作时候的一些复杂、曲折的思想过程似乎没有被人了解，觉得有些批评是直出直入的判断。后来，讨论愈来愈深入了，我的思想开始活动起来。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那些写批评文章写得尖锐的同志，固然他们的文章也被指出了若干缺点，但是，这些尖锐的批评对人是有好处的，它促使你严肃认真地重新考虑一切，它打破了那种高枕无忧的不谦虚的态度。只要自己不气馁，风浪大一点是只会使人受到锻炼的。

对我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批评，绝大多数提出了正确的意见。林默涵、康濯、秦兆阳、唐挚的文章分析得很清楚，我基本上同意。关于自己对这篇小说的看法，我也另外写了东西。我很感谢同志们。当然也有一些可怕的（但没有公开发表的）意见：有人说我的小说和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一样，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样。听了这些意见，真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是这些意见也是善意的，是充满了担忧和期待的。这次批评对我为党工作和写作都是有

好处,真是“胜读十年书”。具体说来有三方面的好处:

一、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写小说最容易流露出心灵深处的东西。我写赵慧文、林震时,做梦也没有想到把他们写成英雄人物。我也知道他们有缺点,反官僚主义胜利不了,但是感情上和他们有共同之处,所以写着写着我就被这两个人掌握了,而不是我掌握了他们。

二、对提高自己的文艺思想有好处。我因为仅仅注意了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忽视了自觉的先进思想对创作的指导作用。过去我只考虑到反映生活,没有更多的想到评价生活。

三、对待批评的态度。有人把批评和百花齐放对立起来,认为一批评就束缚创作。我觉得批评与百花齐放没有矛盾,有批评,文学创作才能发展,正确的批评不会使人变得灰溜溜的。也有个别的批评非常吓人,那就是对文艺作品进行批评时,对作者本人的政治面貌也下了判决。要给作者做鉴定,应该全面了解他的工作和他别的作品,而不应该只根据一篇作品下结论。但这样的批评也有好处,就是很尖锐,使你不能不好好考虑。批评也要百花齐放,批评中的毒草,也可以肥田。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目前创作和批评协作得还不够好,有的批评家过分地喜欢给创作泼冷水,也有些作家特别不欢迎批评,甚至对批评抱有一点敌意。其实,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前进的规律,这个规律当然也是适用于文学创作的。没有批评的文学,就像没有文学的批评一样,都是不能想象的,好的批评对作者的帮助、对读者的帮助都非常大。

文学作品能不能表现人民内部的矛盾呢?我想是可以的。我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表现这种矛盾的一个尝试。它的缺点是在揭露矛盾的同时,未能给人一种强有力的鼓舞,只是大矛盾套小矛盾,套得我自己也发晕。有些同志对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有抵触情绪,一看就生气,以为写了担任某种工作的有缺点的人物,就

是攻击担任这种工作的全体同志,甚至是攻击新社会,这也不对。现在,写歌颂新事物的作品的作者顶多犯教条主义,而写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的作者,写得不好,就会被人看成是诬蔑党、发牢骚。其实写缺点是为了解决矛盾,而不是和谁过不去。我把故事的发生地点写在北京,并不是很有意识的。只是写到报纸时顺手写了《北京日报》。同时,我觉得小说不是真人真事,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北京,也不等于北京真有这样一件事。可是有些人强调我写了北京,北京就那么几个区委会,有人就猜,你不是写这个一定是写那个。我希望做实际工作的人也应该体谅作者的困难和真心,不要乱猜作者的动机。

由于新到工厂来,目前我主要是在熟悉生活、学习,最近没有写什么新东西,但愿能快点拿出点什么,回答那些关心我的读者。

有空去看你们。

握手

王 蒙

4月5日

附:1957年4月16日《北京日报》编者的话

王蒙同志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后,引起了争论。很多读者非常关心地问:对这次争论,王蒙同志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呢?对那些批评,他是怎么个想法呢?还有一些青年人热情而关切地问:王蒙创作的积极性会不会受到挫折呢?根据这些,我们给王蒙同志去了一封信,请他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和他近来的情况。